

谢天振 著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

A Translation Study
Beyond Translation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

谢天振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谢天振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6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
ISBN 978-7-309-10525-4

I. 超… II. 谢… III. 文学翻译-文集 IV. I04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64543号



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

谢天振 著

责任编辑/余璐瑶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579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17.25 字数 209 千

2014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309-10525-4/I·828

定价:49.8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总序

中国的翻译研究可谓源远流长,历史上长达千年的佛经翻译不仅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佛经翻译家,同时也催生了我国古代的翻译研究和相应的翻译思想。这些翻译思想,从三国时支谦的“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到东晋道安的“五失本三不易”,从六朝鸠摩罗什的“依实出华”,到唐代玄奘的“五不翻”,尽管多属片言只语,零篇残什,但其中蕴含着的丰富的翻译思想弥足珍贵,仍然可以为当今的译学建设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像唐代贾公彦关于翻译的定义“译即易,谓换易言语使相解也”,即使从今天的译学高度看,也堪称经典。

自从严复于 1898 年提出了“信达雅”三字以后,这三个字对我国的翻译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差不多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的翻译研究,或是讨论怎样翻译才能做到“信达雅”,或是以“信达雅”三字为标准去评判已有的翻译作品,或是探讨“信达雅”的内涵和外延,等等,几乎到了言必称“信达雅”的地步。至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傅雷提出了“神似”说,钱锺书提出了“化境”说,但其思想实质,严格而言,与“信达雅”说其实并无二致,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怎么译”的问题。然而与此同时,同样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译学界却发生了一场根本性的变化:以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为代表的一群学者站在语言学立场上,运用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视角切入翻译研究,提出了“功能对等”、“交际翻译”、“语义翻译”等概念,刷新了两千年来的西方翻译研究的面貌,实现了西方翻译研究的第一个根本性的突破。

与西方相比,中国当代翻译研究的根本性转变,也即从传统译

论进入现代译论,具体而言,也即从仅仅关注“怎么译”的问题拓展到还要关注“何为译”、“译为何”等问题,时间上要晚一些,其起点可追溯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其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我国外语院系的师生和专家学者第一次有机会走出国门,赴美英等西方国家的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深入访问、进修学习,其中对翻译研究感兴趣的专家学者首先接触到了以奈达为代表的西方翻译研究语言学派的翻译理论,并在国内的学术期刊、大学学报上撰文评说,把他们了解到的信息传递给国内同行。这些文章部分结集成《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①于 1983 年出版,并与翌年编译出版的《奈达论翻译》^②一起,第一次比较多地介绍了外国、主要是西方以及苏联的当代翻译理论,从而为国内的翻译研究吹进了一股新风。之后,随着《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③、《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④、《翻译与后现代性》^⑤、《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⑥等编译著述的出版,更进一步推动并扩大了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与此同时,从 21 世纪初开始,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这南北两家外语出版社先后分别引进出版了数十种当代国外翻译理论著作的英文原版本,让中国读者可以直接面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的英文原著,其产生的影响同样不能小觑。

①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选编:《外国翻译理论评介文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3 年。

② 谭载喜:《奈达论翻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 年。

③ 许钧主编:《外国翻译理论研究丛书》,共收入四本,分别为《当代美国翻译理论》(郭建中编著)、《苏联翻译理论》(蔡毅、段京华编著)、《当代法国翻译理论》(许钧等编著)、《当代英国翻译理论》(廖七一编著),湖北教育出版社,分别于 2000 年、2001 年出版。

④ 廖七一编著:《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译林出版社,2000 年。

⑤ 陈永国主编:《翻译与后现代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⑥ 谢天振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共收入八大译学流派 33 篇译学论文译文,均配以导读文章,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当代的翻译研究也开始发生变化,并朝着实现其根本性转变的方向而发展。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翻译学学科意识的觉醒上。在此之前,尽管中国的翻译活动也称得上丰富多样,译者和译作的数量更是堪称世界之最,中国的高等院校里也都开设了翻译课程,但相当多的人包括高校的一些教师和学生对于翻译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却不甚了了。不少人依然错误地认为,翻译不过就是把别人的东西从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的实践性技能,缺乏自身的原创性,不可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们看不到原本在一个有限的语言环境中产生有限影响的“原创性”著述通过翻译在另一个语境里得到的更大的传播和接受,甚至产生的更巨大的影响。他们更看不到最近几十年来,翻译本身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越来越得到来自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视角的关注和考察。翻译研究借助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阐释学、女性主义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的新理论和新方法,已经突破了语言中心主义的狭隘模式,而成为广义的文化研究平台下的一个分支学科领域。翻译研究也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和文化研究学者,甚至包括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关注目光。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成为当今国际学界的共识。与之相应,在中国经历了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翻译学的大讨论后,终于在 21 世纪之初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已经得到了体制内的承认:目前已有 159 所高校建立了翻译硕士专业(MTI),另有一百余所高校建立了独立的本科层面的翻译系。此外,多所高校还都招收翻译学的博士生。

其次,体现在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觉醒和跨文化研究视角的应用上。在中国,自清末民初以来的翻译研究多围绕文学翻译展开,而在文学翻译界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是:翻译是一门艺术,或者说是一种具有再创造性质的艺术,于是翻译理论也就被定位在建基于这样一种艺术实践中获取的经验之上,并反过来要求其能够指导翻译实践。由于这个原因,中国自近代以来的翻译研究,大

多是围绕着翻译实践展开的一些经验体会,并无严格意义上的理论可言。但是随着翻译学这门学科在最近几十年来的日臻成熟,当今的翻译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跳出原先局限于语言文字转换框架内的“术”的层面,而越来越多地上升到关于翻译的思想和原则的“学”的层面。这样的翻译研究成果往往能够改变人们对某种既定的翻译行为、标准、方法等的看法,导致一种新的翻译实践模式的诞生。不难想见,在当今这个全球化时代,翻译必将继续占据人类知识领域的重要位置,并在未来的岁月里继续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因此,传统的居于对比语言学之下的翻译的定义应当根据翻译的最新发展进行修正和完善,翻译的内涵应该进一步扩大,要把翻译从纯粹字面意义的转述定义为文化层面上翻译、阐释和交际。令人感到欣慰的是,中国学者的翻译研究成果,如谢天振的《译介学》^①、《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②,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③、《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④,许钧的《翻译论》^⑤等著述所作的研究,正好契合了当今国际译学的最新发展趋向,并站在中国学者的独特立场,发出了中国学者的声音。

再次,体现在对翻译史研究和翻译批评研究的高度重视上。在此之前,中国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史著作,对翻译史的研究同样少之又少。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学者在翻译文学史、翻译史的编撰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迄今为止,翻译史类的著述已经超过30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对翻译史的研究也取得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2013年译林出版社推出该书的增订本。

②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③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

④ 王宁:《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⑤ 许钧:《翻译论》,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

了长足的进展,王宏志的《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①、《翻译与文学之间》^②,廖七一的《胡适诗歌翻译研究》^③、《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④等,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与此同时,作为翻译学学科三大支柱之一的翻译批评同样得到了高度重视,许钧的《文学翻译批评研究》^⑤较早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最后,中国学者也没有遗忘翻译研究中的语言学视角,他们同样在这一领域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探索,并取得了不俗的成果,如黄国文的《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⑥和王东风的《连贯与翻译》^⑦等著述。

然而,尽管最近二三十年来我们在翻译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的一些学者还在国际翻译研究或文学和文化研究刊物上主持过介绍中国翻译研究的专号^⑧,但是总的说来,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国际学术界对中国学者的译学研究成果并不是很了解。而由于传播的局限,甚至国内读者对于哪些学者和哪些著述能够代表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也不是很清楚。为此,我们决定编选一套翻译研究丛书“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集中展示中国当代翻译研究学者的代表性论著。我们将先推出“文库”的中文版,

① 王宏志:《重释“信达雅”——二十世纪中国翻译研究》,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

② 王宏志:《翻译与文学之间》,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③ 廖七一:《胡适诗歌翻译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廖七一:《中国近代翻译思想的嬗变》,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⑤ 许钧:《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译林出版社,1992年。

⑥ 黄国文:《翻译研究的语言学探索》,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年。

⑦ 王东风:《连贯与翻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9年。

⑧ 如王宁为 *Perspectives: Studies in Translatology, Neohelicon, Amerasia Journal,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等十多家国际英文期刊主编了翻译研究与文学和文化研究方面的专辑,许钧与王克非也为 *META* 主持过“中国翻译实践与理论”的专号,等等。这些专辑不仅发表了数十位中国学者研究翻译的论文,同时也加快了中国人文学科国际化的步伐。

然后推出它的英文版,在国外著名出版社出版。入选本“文库”的作者应该是能够代表当代中国翻译研究的前沿,其著述不仅在国内译学界处于领先地位,其中的一些论述也已经或者有可能引起国际学界关注,进而通过将来英文版在国际权威出版社的出版,使得中国的翻译研究进一步得到国际学界的了解和承认。在甄选“文库”的人选时,我们也有意考虑有不同学术背景、不同学科背景、不同外语语种的作者,尽量使入选的作者更具代表性。首批入选的六位作者既有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也有语言学背景;既有外国文学背景,还有中国文学背景。在外语语种方面,除英语外,还有俄语和法语背景的学者。入选的论文集原则上由作者本人从他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精选出 15—20 篇的代表性论文,按内容编成三至四个部分,每本书的总字数控制在 20 万字左右。

“中国当代翻译研究文库”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第一辑入选的六位作者的论文集标题分别是:谢天振的《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王宁的《比较文学、世界文学与翻译研究》,许钧的《从翻译出发:翻译和翻译研究》,王宏志的《翻译与近代中国》,廖七一的《翻译研究:从文本、语境到文化建构》,王东风的《跨学科的翻译研究》。在条件成熟时,我们还将陆续推出第二辑和第三辑。我们希望通过本“文库”的编选和出版(包括在国外权威出版社出版),不仅能为当代中国的翻译研究作出贡献,同时还能把能够代表中国译学研究前沿的专家学者及其代表性著述带入国际翻译研究界,让世界更直接、更快捷地了解中国的学术,让中国翻译界的学术研究切实有效地走出国门。

谢天振 王 宁
2014 年 2 月于上海

前 言

我很早就萌发了对翻译,尤其是对文学翻译的兴趣,“文革”期间曾无偿无名地为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了一百多万字的内部资料,不过都不是文学作品,极大部分是政治、经济方面的文献。其中有一篇关于经济学的论文发表在“文革”时期的一本内刊《摘译》上,另一篇回忆列宁的长篇文章则在“文革”结束后公开发表,收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列宁》的文集。“文革”结束后,我通过考研究生重返上外学习,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工作。在此期间我又翻译了近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从俄文翻译了《普希金散文选》以及《南美洲方式》、《硫磺泉》等苏联和俄罗斯的长、中、短篇小说,还与几个朋友合作从英文翻译了长篇传记《狄更斯传》。此外,我也翻译过学术专著《比较文学引论》以及一些学术论文等。但是把翻译作为自己的学术研究对象,却还是比较晚的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陈思和与王晓明两位教授当时正在为《上海文论》主持一个“重写文学史”的专栏,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与思和过从较密,他知道我对翻译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问题有些自己的思考,同时他也认为中国文学史应该关注翻译的问题,所以他热情地邀请我为他们的专栏写一篇这方面的文章,这也是我发表《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的缘起。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报刊文摘》还摘介了文章的主要观点。但在引来一些赞赏声的同时,我关于翻译文学的地位及其国别归属的观点也招来不少质疑声。为此,我又接连发表了《翻译文学史:挑战与前景》、《翻译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组

成部分》、《论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等十余篇论文。然而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人心存疑惑:“翻译文学明明是外国文学,怎么一下子成为中国文学了呢?”还有人(特别是一些老翻译家)觉得,翻译就是要讲究忠实,怎么可以提“创造性叛逆”呢?……质疑之声不一而足。针对这种情况,我决定写一本专著全面深入地论述翻译和翻译文学的问题,并把专著的书名取名为《译介学》,因为我要探讨的问题并不是局限在传统意义上的翻译学框架之内的一些表面的语言文字转换问题,而是把翻译的传播、接受、影响及其背后的制约因素等问题也一并纳入我的研究视野。其实,所谓译介学研究,质言之就是超越文本,超越翻译,站在跨文化交际的高度审视翻译,分析翻译,研究翻译。

《译介学》很快就列入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出版计划。然而正当我全力以赴投入《译介学》的写作之中时,我意外地获得了一个由加拿大政府资助的赴加拿大阿尔贝塔大学比较文学系做半年高级访问学者的机会。此行的项目任务是考察加拿大的比较文学研究并在回国后写成论文在国内重要刊物上发表,这个任务于我来说并不算困难,这样我在考察之余便赢得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收集与阅读其他相关的文献,包括与翻译研究有关的文献。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接触到了大量第一手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文献,尤其是反映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理论文献,使我对当代西方翻译理论及其研究趋势有了比较全面而又深刻的认识,也为我日后的译学研究包括主编《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等项目奠定了基础。

我相信我是国内学术界少数几个最早接触到并发现当代西方翻译研究文化转向动态的学者之一,这当然要归功于我的比较文学学科背景。众所周知,比较文学的研究特点是立足点高,高屋建瓴,视野开阔,跨学科、跨语言、跨民族、跨文化。这样,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不仅大大拓展了我的学术视野,更加深了我对某些特定领域的认识,其中就包括翻译研究。我很难形容我最初读到霍尔

姆斯(James S Holmes)的《文学翻译和翻译研究论文集》、读到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的《文学理论与翻译文学》、读到当时刚刚发表的埃文-佐哈(Itamar Even-Zohar)的《多元系统论》和《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以及读到图里(Gideon Toury)的论文集《翻译理论探索》、苏珊·巴斯奈特的专著《翻译研究》等著述时的激动兴奋之情,因为我在这些著述中清晰地感觉到了这些学者的观点与我此前一直在孜孜求索和积极阐述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所以也难怪后来我在台港译学界的有些朋友会戏称我是(中国)大陆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加拿大半年的访学使我看到了此前我所进行的翻译研究的译学价值,并进一步确信,我的《译介学》写作及其学术理念与当代国际译学界的前沿学术研究和发展趋势正好一致,异曲而同工,而之前我只注意到我的研究中的比较文学价值,却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译学意义。所以可以这么说,加拿大之行坚定了我的译学研究的道路。

因此,从加拿大回来以后,在完成了专著《译介学》^①的撰写以后,我有意比以前更多地参与到国内译学界的活动,并积极发表我个人的见解,尽管我的观点会引起一些人的激烈反对。我认为,我们在译学理论认识上比西方“迟”了一二十年,并不要紧。更何况承认在翻译理论研究的认识上比西方“迟”,并不就意味着西方的认识全是正确的,我们都得照搬。我觉得,当前国内翻译界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实现译学观念的现代化转向,正确处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尽快摆脱“匠人之见”——不要因为建造过几间茅草屋或小楼房,便自以为是建筑大师,自以为最有发言权,而对国内外的建筑理论不屑一顾,甚至嗤之以鼻,视为“空谈”。现在很有必要提醒我们国内翻译界的同行们,正视国际译学界的有关进展,调整心态,认真研究,切实建设发展我们自己的译学理论、译学事业,这才是我们的当务之急。

① 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我发表了一系列观点鲜明的论文《国内翻译界在翻译研究和翻译理论认识上的误区》、《论译学观念现代化》、《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等,推出了我的个人论文集和专著《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北业强版)^①、《翻译研究新视野》^②、《译介学导论》^③,主编或合作出版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④、《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⑤等著作。与此同时,我还每年编选一本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选,作为《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中的一卷。从2001年起,我总共编了11年,让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中找到了它的位置^⑥。通过这些论文和专著,我进一步全面阐述了我的译介学思想,论述了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分析了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探讨了译介学研究的发展前景与广阔空间,从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较为强烈的反响。让我感到特别欣慰的是,最近一二十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和硕、博士生运用译介学的理论视角展开他们的研究或撰写学位论文,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译介学研究也引起了我国国家层面相关社科领导部门的重视,譬如他们在制定国家课题指南时,把“译介学”与“马列文论与当代外国文论”等同时列为2006年外国文学课题指南中的八大课题之一,在制订“十一五国家哲社规划”时,又把“译介学”与“外国文学学科理论创新”、“西方当代文学思潮与外国文学若干前沿问题”等课题同时列为“规划”的内容。

①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台北业强出版社,1994年。

② 谢天振:《翻译研究新视野》,青岛出版社,2003年。

③ 谢天振:《译介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④ 谢天振:《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8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⑤ 查明建、谢天振:《20世纪中国外国文学翻译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

⑥ 因为无法及时一一解决收入该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选集的作者版权问题,从2012年起我放弃了编选年度翻译文学作品选的工作。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国内翻译学学科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我对翻译学学科理论和教材建设给予了更多关注,一方面主持编写了《中西翻译简史》^①、《简明中西翻译史》^②等供国内高校翻译专业用的翻译史教材;另一方面,针对当前国内外翻译和翻译研究的现实及发展趋向,我发表了一系列有关翻译的职业化时代的理念与行为的论文,包括《中西翻译史整体观探索》、《翻译即跨文化交际——2012年国际翻译日主题解读》、《从翻译服务到语言服务》等,同时还推出了补充完善我的译介学思想的专著《译介学》(增订本)^③、个人论文集《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版)^④、一本普及性学术专著《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⑤和一本关于翻译和翻译研究的学术散文随笔选集《海上译谭》^⑥。

从以上对我的学术研究道路的简单回顾不难发现,我的译学研究首先是从比较文学的立场出发,从探讨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问题起步,然后拓展到对翻译文学史和文学翻译史的研究,这也构成了我的第一阶段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本书“上编”收入的6篇论文基本上就是反映我在这一阶段所做的探索,其主要观点可归纳为:一是在国内学术界首次明确提出翻译文学不等于外国文学,而是国别文学(对我们而言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二是厘清翻译文学史与文学翻译史的区别,提出翻译文学史具有一般文学史同样的特征,应由作家(对翻译文学史而言是原作

①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

② 谢天振、何绍斌:《简明中西翻译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

③ 谢天振:《译介学》(增订本),译林出版社,2012年。

④ 谢天振:《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该论文集尽管与此前台北业强版的一本论文集同名,但其中收录的29篇论文仅4篇与业强版重复。

⑤ 谢天振:《隐身与现身——从传统译论到现代译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⑥ 谢天振:《海上译谭》,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

家和翻译家)、作品(译作)和(翻译)事件三大要素构成。这也是国内翻译界一直比较混淆的问题,即把文学翻译史混同于翻译文学史。有必要指出的是,我对翻译的最根本性质——创造性叛逆——的阐述以及由此引出的一些相关观点颇引起学界尤其是翻译界个别老翻译家的不理解甚至误解,他们总也搞不明白为什么要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翻译文学怎么成了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①,等等,为此我不得不在近年仍然写一些文章就这些观点进行进一步的阐释,这也是为什么6篇文章中有3篇文章^②的发表时间并不在我的译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而就在最近这几年的原因。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由于我在加拿大访学时打下的基础,所以我对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最新走向更为关注。与此同时,我的学术活动圈子也不再局限于比较文学界,而是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国内的翻译研究界,这样我的目光也更多地投向了当代国际译学界的最新发展趋向,即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由于当代国际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与我此前一直在进行的译介学研究正好不谋而合,所以也就更加激发了我对当代国外译学研究的兴趣和热情。

①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专家学者对翻译文学的性质及其国别归属问题感到迷惑不解。去年年末有专家在审读我为曹顺庆教授主持编写的《比较文学概论》中“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一节时就对我提出的“不能把翻译文学简单地等同于外国文学”的观点提出质疑,对于我把翻译文学说成是“外国文学的载体”,“正如我们家里的电话机,尽管它传递的是他人的信息,但它并不因此就归他人所有”的比喻,认为“从版权的角度出发,这种提法值得商榷”,用“电话机”来比喻文学翻译,“亦不贴切”。实际上,从版权的角度更要确认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为译者享有对译作的版权这恰恰是我们许多人所忽视的。而把翻译文学(而不是这位专家所说的“文学翻译”)比喻为“电话机”,以突显其传递外来信息的功能,其实还是比较形象的。

② 指《非常时期的非常翻译——关于中国“文革”时期的外国文学翻译》,发表于2009年《中国比较文学》第2期;《创造性叛逆:争论、实质与意义》一文,发表于2012年《中国比较文学》第2期;《翻译文学史:探索与实践——对新世纪以来国内翻译文学史著述的阅读与思考》,发表于2013年《东方翻译》第4期。

而更主要的是,我认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深刻地揭示了翻译的跨文化交际本质,极大地拓展了翻译研究的空间,显示了当今译学研究发展的必然趋向,所以我撰写了多篇阐述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理论文章,收入本书“中编”的5篇论文都属于这一性质。其中《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三大突破与两大转向》通过对当代西方翻译发展史的梳理,揭示了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向,指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其翻译研究历史发展的必然;《作者本意与本文本意——解释学与翻译研究》、《译者的诞生与原作者的“死亡”》和《多元系统理论:翻译研究领域的拓展》三篇文章则通过我个人的理解和接触到的翻译实例,分别具体阐释了解释学理论、解构理论以及多元系统论与翻译研究的关系,希望以此能为国内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些借鉴。鉴于国内译学界的某些学者围绕着国际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一直存在着一些似是而非的理解与认识,以为“文化转向”偏离甚至背弃了翻译和翻译研究的本体,呼吁要“回归翻译本体”。为此我发表了《翻译本体研究与翻译研究本体》一文与相关专家学者进行商榷,我质疑“翻译研究本体是否仅仅是对所谓的翻译本体(即语言)进行的研究?只研究所谓的翻译本体也即只关注文本以内的语言问题,能够全面、深刻揭示‘语言转换的规律’吗?”我还针对某些学者的观点进一步指出:“而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翻译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那么翻译的运作也就不可能是一个简单的语言文字的自动转换,在语言文字转换过程之外,它必然还包括译者、接受者等翻译主体和翻译受体所处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语境,还包括对两种语言文字转换产生影响和制约作用的各种文本以外的诸多因素。翻译研究只有把所有这些问题都包括进去,才有可能成为完整的翻译研究本体,也才有可能使翻译学成为真正的‘学’。”从某种意义上而言,这段话似也可视作是本书书名“超越文本 超越翻译”的一个脚注。这篇文章也收录在本书的“中编”之中。

对我而言,主持编写教材《中西翻译简史》的最大收获是形成

了我的中西翻译史整体观。在此之前,尽管我也曾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设过多年的“西方翻译史”课,也主持编写过“中国翻译文学史”等项目,但都不免有失偏颇——不是在地域上偏向一方(西方),就是在内容上偏重某方面的内容(文学翻译)。而主持编写《中西翻译简史》促使我对两千余年的中西翻译史进行了一次全面深入的梳理,我发现,无论中西,“翻译与宗教”、“翻译与知识传播”、“翻译与民族语言的确立与发展”、“翻译与文化价值的传递”、“翻译与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都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从这几个视角切入便能够把两千余年来中西翻译的两条发展脉络融合成一个整体,从而对中西翻译史获得更加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

这也就引出了我主持编写《中西翻译简史》得到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即发现了中西翻译界一些基本翻译理念发生、形成及其演变的规律。我在该教材的“前言”中指出:“中西翻译史上的译学观念与各发展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特定历史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是形成该历史阶段的主流译学观念的重要制约因素。譬如,正是中西翻译史上第一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宗教文献——奠定了人类最基本的译学观念,诸如‘原文至上’观、‘忠实原文’观,等等。第二阶段的主流翻译对象——文学名著、社科经典——在继承、肯定第一阶段译学观念的基础上,又进一步丰富、深化了人类的译学观,并提出了许多关于翻译的新思考,诸如‘翻译的风格’问题、‘翻译的文体’问题、‘形式与内容的矛盾’问题,等等。”^①

上述“发现”也为我划分中西翻译史上的发展阶段提供了切实的依据,正是依据这一“发现”,我把中西翻译史划分为三大发展阶段,即宗教文献翻译阶段、文学翻译阶段和非文学(实用文献)翻译阶段。而最后一个阶段即“实用文献翻译阶段”的提出,又把人们(也包括我自己)的眼光引向了对翻译所处的当下阶段性质的思

① 谢天振等:《中西翻译简史》,第Ⅷ页。